

2009年 第二卷 (2)



西部商学评论

Review on Western Business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西部商学评论

2009 年第二卷 (2)

Review on Western Business

主编 李忠民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商学评论. 2009 年. 第 2 卷. 2/李忠民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5058 - 9174 - 6

I. ①西… II. ②李…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804 号

责任编辑: 范 莹
责任校对: 杨 海
技术编辑: 董永亭

西部商学评论

2009 年第二卷 (2)

主编 李忠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编辑中心电话: 881914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出版社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读者服务部: [www. jkbook. com](http://www.jkbook.com)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9 印张 190000 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174 - 6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部商学评论》编委会

主 编：李忠民

副主 编：尹海员

编辑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祥利	王艳伟	王琴梅	王兆萍	石 英
孙根年	刘 磊	刘开瑞	邢邱丹	李华敏
许 军	张正军	胡秋灵	胡 杰	周晓唯
袁方建	雷宏振	睢党臣	黄湛冰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何炼成（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学术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

井润田（电子科技大学）

冯根福（西安交通大学）

任宗哲（西北大学）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金融研究中心）

何伦志（新疆大学）

何凤隼（宁夏大学）

朱方明（四川大学）

李 垣（西安交通大学）

李忠民（陕西师范大学）

赵捧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杨乃定（西北工业大学）

杨先明（云南大学）

郑长德（西南民族大学）

姚慧琴（西北大学）

高新才（兰州大学）

张正军（陕西师范大学）

张俊瑞（西安交通大学）

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金融研究中心）

扈文秀（西安理工大学）

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目录

1	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模式选择	葛兆强
16	财政收入、税收政策及宏观经济波动研究综述	何燕 马丽 周靖祥
29	中国西北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薛继亮 李录堂 王敏
39	山西省虚拟煤炭产业集群研究	郭小蓉 靳共元
50	住房抵押贷款评估的博弈分析	石阳 王满仓
60	赤道原则：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冯守尊
74	城市贫困的联合方法研究：多维视角和研究路径	程志明
85	乡镇改革评论	彭华
100	信任与企业战略：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	倪昌红 邹国庆 高向飞
113	乡村旅游地品牌个性特征研究 ——以西安长安区“农家乐”为例	白凯 张春晖
125	劳动力稀缺、人力资本深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对我国现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探析	姚宇 刘育红



Contents

- 1** Economic Crisi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hoice of Market Economy Model
Ge Zhaoqiang
- 16** A Survey of Fiscal Revenue and Tax Policy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He Yan Ma Li Zhou Jinxiang
- 29** Promotion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in China Northwestern Region
Xue Jiliang Li Lutang Wang Min
- 39** Research on the Coal Industrial Virtual Enterprises of Shanxi
Guo Xiaorong Jin Gongyuan
- 50** Game Analysis of Real Estate Appraisal
Shi Yang Wang Mancang
- 60** Equator Principles: Commercial Ban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osters
Feng Shouzun
- 74** Mixed Methods Study of Urban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Cheng Zhiming
- 85** The Comments on Township Reform
Peng Hua
- 100** Trust and Firm Strategy: A Theoretical Frontier and Empirical Study Review
Ni Changhong Zou Guoqing Gao Xiangfei
- 113** A Study on Rural Tourism Brand Personality: A Case of "Nongjiale" Xi'an Chang'an
Bai Kai Zhang Chunhui
- 125** Scarcity of Labor, Human Capital Deepening and People'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Yao Yu Liu Yuhong

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与市场 经济模式选择^①

葛兆强^②

|摘要| 本文在分析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技术进步、制度演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制度演进和制度选择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然后，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四种模式及其制度基础，提出了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必须由目前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逐步过渡到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危机 经济增长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
企业家型市场经济

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大多数国家（地区）追求的目标，但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不增长却是容易出现的现象。在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通常会经历一个扩张与萧条的周期循环过程。尽管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长的质量大相径庭，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程度也是不同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模式至少包括寡头型、国家主导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四种形态，它们之间具有“好”与“坏”的价值含义。有些市场经济模式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有些市场经济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容易造成经济波动。因此，对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选择，将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后果。2007年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对本次全球经济危机

① 本文是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子课题（2007B080703005/05）的阶段成果。

② 葛兆强：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进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问题，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产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如果考虑到人口增加和价格变动情况，经济增长主要指的是人均福利的增长。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观察，经济增长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过程，其中伴随着若干个扩张与衰退交织的经济周期，即经济增长通常会经历繁荣——萧条——复苏——繁荣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过程。

（一）经济周期是经济增长的规律性现象

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经济周期是指国民收入及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指实际 GDP 或总产量绝对量的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而现代宏观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的交替过程。根据这一定义，衰退不一定表现为 GDP 绝对量的下降，而主要是 GDP 增长率的下降，即使其值不是负值，也可以称之为衰退，这种衰退被称之为增长性衰退。因此，经济周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经济周期不可避免；二是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的总体性、全局性波动；三是经济周期的长短由周期的性质决定；四是虽然每次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相同，但每个周期都是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根据经济周期时间的长短，经济学家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一般是 3~4 年一次；中周期平均时间长度为 9~10 年；长周期的时间跨度通常是 50~60 年。

对于经济周期，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解释。总体上，经济周期理论可分为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和外生经济周期理论两类。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当然，这类理论并不否认经济体系外部因素对经济的冲击作用。最具有代表性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理论。此外，比较著名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还包括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心理周期理论等。外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经济体系的外部因素引起的。这种理论并不否认经济中的内在因素（如投资、货币等）的重要性，但它们强调引起这些因素变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体系之外。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周期理论和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理论是外生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

（二）经济危机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过程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观察，一部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危机的历史。以美国为例，自 1783 年取得了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先后于 1825 年、1837

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1957~1958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1980~1982年、1990~1991年，以及2007年以来多次发生过经济危机。其中，以1857年、1929~1933年和2007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1857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大量倒闭，而且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崩溃，导致了众多银行的倒闭和近十万家企业破产，而且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倒退至1913年水平。虽然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使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但危机真正解除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历了以下几个周期：一是1947~1956年。该时期美国政府延续了罗斯福时代开始的干预政策，发动朝鲜战争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带动了1950~1953年的繁荣。战争结束后，美国失去了刺激经济的主要动力，经济开始下滑。二是1957~1972年。这一周期是因为美元危机的爆发、越南战争与科技发展。三是1973~1979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再加上石油价格急速上升，引发全球经济的持续滞胀。四是1980~1989年。里根政府通过减税扩大个人消费，增大军事开支刺激需求，配合下降的石油价格，经济持续了8年的高速发展。五是1990~2000年。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了美国新经济扩张，同时，实现了低通胀、低失业率，政府赤字不断减少。这次空前繁荣主要得益于IT产业的高速发展及美联储采取的中性货币政策。但是，经济快速增长掩盖了家庭储蓄过低、私人债务增长、贫富差距增大、股市泡沫严重等问题。六是2001年以来。在IT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爆发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国陷入衰退，格林斯潘开始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和利用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刺激经济。结果，2007年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以2007年3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此后，随着股市的暴跌和一系列投资银行的破产和并购，局部性的信贷危机演变为一场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

美国的历史表明，经济增长总是难逃经济周期，经济增长也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经济增长进入极端繁荣阶段后的一种必然现象。正如特维德所言：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2007年以来爆发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是空前的经济和财富创造之后一次周期性的再调整，依然属于拉斯·特维德所说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它再次验证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论断：经济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可以单独摘除，而是像心跳一样，是有机体的核心。

二、技术进步、制度演化与经济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集中关注两种：一是更多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二是创新与技术进步。当然，人们还从文化、地理条件、教育、民主等维度对经济增长的源泉给予了解释。罗森堡曾经总结概括出了科技和发明、自然资源、心理因素、运气、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剥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奴隶制度等九方面的传统解释。从传统经济学理论看，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主要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

（一）资本、劳动与经济增长

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着重分析了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哈罗德用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这三个概念分析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和波动的原因。实际增长率是实际所发生的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和实际资本—产量比率决定；有保证的增长率（或合意增长率）是长期中理想的增长率，它由合意的储蓄率与合意资本—产量比率决定；自然增长率是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它由最适宜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决定。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相一致。如果这三种增长率不一致，则会引起经济中的波动。具体来说，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的背离，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当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增长率时，会引起累积性的扩张。相反，当实际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时，会引起累积性的收缩。从长期来看，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的背离也会引起经济波动，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时，有保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将会出现长期停滞。反之，将会出现长期繁荣。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强调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从而使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提高；或者可以通过降低人口增长率，从而实现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提高。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整人均资本的值而使人均产量变动。在20世纪60~8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占据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地位。随着人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深入，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缺陷逐渐暴露。如根据该模型的观点，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要快于发达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是，有些落后国家的增长速度反而低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反思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

（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集中讨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一个

经济社会技术进步的快慢和路径是由这个经济体系中的家庭、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行为决定的。罗默认为，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的行为，提高了知识水平，由于知识有正的外部性，从而引起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卢卡斯认为，发达国家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经济持续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还有学者强调，从事生产过程也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干中学”积累起来的经验使劳动力和固定资产的效率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提高。总之，技术进步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如对研究和开发提高补贴，对文化教育事业给予支持，用税收政策鼓励资本积累等，以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对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理性。从西方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在持续的增长过程中，一些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发明和革新为人们所熟知，但这些重大革新并未改变经济增长在整体上的渐近性特征。因为，尽管重大革新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相对集中（如工业革命），但它们直接影响的只是经济的一部分，其对全社会的影响往往要经历数十年时间方能逐步体现出来。尤其是，新技术、新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累积性的，而大数定律又多少会把这一影响均衡地分布到不同的时间段。很多技术成就或许在多少年以后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一项成就就能立即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显著提高，并由此终结由于战争、农业歉收、金融崩溃以及商业周期所造成的经济短期波动。而且，如果仅靠技术进步或科学发明就足以使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由贫困走向富裕，那么，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没有率先摆脱贫困实现富裕？在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过渡时期，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科学和发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此外，科学和发明属于知识范畴，通过书籍和讲授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将这些知识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社会。但事实证明，要把经济增长的钥匙传递给落后国家，比传授科学知识要困难得多。因此，从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历史进程看，技术进步和科学发明不是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根植于制度之中。

（三）制度演化与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相互调整的基础上。可见，经济增长不仅指产品和劳务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指生产产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而这种能力的增长一方面源于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源于制度与意识的调整，制度是先进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欠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制度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道格拉斯·诺思对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期间海港运输生产率显著提高。但是，同时期的海洋运输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进步。那么，导致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因素究竟为何？诺思的答案是：制度。制度因素在这里体现为“海洋安全因素”和“市场经济因

素”。由于海盗受到了打击，海运比过去安全性大大提高，保险费用下降，商船上配备的武装护航人员相应减少，担负的实际货运吨位有了提高，而且船的速度也加快了。从市场因素角度分析，该时期市场经济扩大，待运的货物数量增加，这样就减少了空返，也减少了船只在港口停泊的时间。同时，由于在港口可以雇佣到装卸工，船上可以只保留必要的船员，从而减少了海上航行期间的劳动成本。诺思的结论是，尽管技术上并无重大进步，但只要制度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诺思和托马斯将上述分析方法运用于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出版了著名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他们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一书中，罗森堡与小伯泽尔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不断积累外，西方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贸易、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创新。从18世纪中叶起，随着创新范围的不断扩大，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尽管这一观点并未超越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熊彼特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经济周期理论，但是他们重申并强调了以创新促增长体系的关键因素：创新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创新决策权应高度分散化；不存在政治和宗教对试验的限制；赏罚结合的激励机制，对成功的试验给予丰厚的经济回报，对失败的试验予以严厉惩罚。更为重要的是，促进西方经济增长的创新与一系列灵活的制度安排以及多元化的政治气氛互为因果。而且，这些制度安排和政治气氛对西方世界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分离、相容、促进。

在罗森堡与小伯泽尔看来，一方面，技术创新与制度演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例如，在通讯手段落后的时代，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几乎毫无疑问地只能在城市发展；由许多商人共担风险的保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必然要与商人在城市的集中化互为基础；为了保证商业合同的法律效力，要求社会上存在足够的法官、律师、仲裁者等专业法律人士；储蓄业务的开展同样要求银行家首先在本城市商人中赢得信任。在这一系列持续强化的创新中，市场的自由准入、对私有产权的厘定与保护、银行和金融体系、司法独立、企业组织多样化、科学共同体、工业研究实验室，乃至民主政体等众多新要素的诞生，并反过来定义和建立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进一步印证了诺思关于“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的观点。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分散与多元，同样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不是一个“帝国公司”，而是包含许多相互竞争的“君主公司”、“诸侯公司”和“城邦公司”，为了保证从商人阶层获得足够的收入和信贷来支持军事力量，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展开了残酷但有益于进步的竞争。相反，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任人唯贤的文官制度“把最优秀的人几乎都吸收到了统治阶级中，并由此导致了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因此不存在政治层面上为获取商业支持而展开的竞争”。西方社会的权力分散以商人、企业家或资本家的存在

为先决条件，这些阶层最终成长为西方最重要的经济决策者，并通过自主决策来相互竞争。正是自由而分散决策的机制带来了持久的组织和技术变革。但是，西方国家促进发展所使用的试验方法，与政治独裁下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体制并不适应，这会让统治者产生失去控制权的感受。实质上，这是对“中央计划部门”的质疑与批判。需要重视的是，19~20世纪西方政治统治集团不行使权力这一点，最终极大地增加了它们的财富和政治权力，高效政府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它有助于生命安全的保障和物质福利的增进。这既是西方世界由贫困变为富裕的秘密所在，也说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综上所述，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而且，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各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在长期中，更多的投资（投入更多的劳动和资本）可以提高总产出的水平，但不能提高其增长速度。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增长，将一个经济从收益递减中解放出来，但忽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就会陷入“路灯谬误”——丢了钱的人在路灯下寻找，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灯光，而不是因为那里是丢钱的地方。笔者认为，制度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基础因素。吴敬琏先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同理，制度也重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其他各种因素充分释放出引致经济增长的效能；而一个坏的制度，则会扼杀任何其他因素的经济增长引致效能。

三、市场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改革深化

传统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但是，市场经济不成功的案例亦比比皆是。因为，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具有单一形态的经济体制，而是具有多种模式形态，这些模式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坏的市场经济则难以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离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何避免坏的市场经济，从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主题。

（一）市场经济的四种模式

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前，人们对于经济体制的认知，存在着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即世界上只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模式。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之上，两者泾渭分明。但是，历史和现实表明，市场经济至少包括寡头型、国家主导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四种市场经济基本形态。

1. 寡头型市场经济

寡头型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最低级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权力和金钱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尽管它在名义上属于资本主义，但政府的政策设计主要或完全

是为了促进那些执政的集权统治者及其亲朋好友的利益。在拉美、中东和非洲的很多国家，这种模式很流行。一般而言，寡头型市场经济具有几个共同特征：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极其不平等；二是高比例的“非正规活动”；三是腐败严重。

2.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指的是国家把增长作为核心经济目标，但试图通过优先发展某些特定企业或特定行业来实现经济目标。其显著特征是政府来引导市场，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这种模式的阶段性成功，容易使这些经济体认为国家主导将永远发挥作用，这会误导政府未来的政策选择。二是容易导致政府的过度投资，加剧产能过剩。三是当这些经济体接近技术前沿，在由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选择下一个“赢家”的时候，他们就会面临选错“赢家”的巨大风险。四是容易诱发腐败。如果企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在这样的经济中总存在着腐败的危险。五是“拔掉插头”和重新配置政府资源的困难。一旦国家向特定的企业或部门承诺了资源和特权，那么，当这些企业需要进行重组或者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超过它们的时候，政府就很难“拔掉插头”停止向它们输送资源和特权。

3. 大企业型市场经济

在大企业型市场经济中，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大企业主导的。尽管小企业也广泛存在，但通常是小型的零售或服务型企业。大企业型市场经济主要存在于欧洲、日本、韩国和其他经济中。与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一样，大企业型市场经济也取得过很好的经济业绩。但是，大企业型市场经济也有其致命弱点。大企业型市场经济通常是寡头性的，寡头企业相对厌恶风险，这不仅因为它们官僚机构，需要有各级管理人员来批准创新的成果，而且也因为它们不愿支持创新，担心创新对目前占其利润主体的产品或服务构成威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之后，西欧和日本都未能赶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由信息技术驱动的美国生产率复兴的浪潮。

4. 企业家型市场经济

在企业家型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参与者不仅有足够的动力和激励进行创新，而且能够从事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不断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这种突破性创新比大企业型市场经济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得多，而且提升了人类生活水平。最近200年来，产生了铁路、汽车、飞机、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等诸多革命性的产品创新，并创造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各项技术，包括大型电脑和个人计算机、路由器和其他硬件设备，还有设备运行所需的软件。这些前沿性、突破性的创新从何而来？如果没有企业家，这些改变世界的技术、产品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就不会存在。是企业家们发现了出售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然后采取了行动。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市场经济模式，唯一相同之处是其产权基础——财产的

私人所有。除此之外，它们迥然不同。当然，没有哪类模式在任何时候、任何经济中都占主导地位。

（二）哪种市场经济更能实现经济增长

对于每一种具体市场经济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环境下，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即使大企业型与企业家型市场经济的混合也不是所有时期、所有经济的正确选择。判断一种经济模式的好与坏，除了从经济层面进行分析外，还必须结合政治、法律、人文等环境条件进行深入考察。

关于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坏的市场经济，许多学者曾有过论述。吴敬琏认为，好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是它具有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体系，商品（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市场、自然资源市场、金融市场等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二是市场游戏规则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市场经济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钱颖一认为，好的市场经济是有效率、有活力的经济，法治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错误的价格导致扭曲的激励。在他看来，任何市场经济中都存在着两种掠夺：私人掠夺与政府掠夺。政府掠夺包括三类：一是政府作为一种组织进行的掠夺，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税费、通货膨胀等。二是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把社会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三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进行的掠夺。如一些行业、企业为寻求垄断，游说政府对潜在竞争对手设定市场准入的限制等。通常，人们对掠夺的直接反应是不公平。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掠夺会破坏激励，损害效率。如果一个社会的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很多，那么，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减少创造财富、提高效率的活动，增加掠夺和寻租的活动。无论是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还是转轨国家，坏的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对两种掠夺约束不够。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反映了政府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对政府掠夺约束不够，意味着政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大。孙立平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三方面：从经济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法治角度看，标志是法治是否健全。法制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社会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建立了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基于以上学者的分析认识，笔者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不存在政治垄断。有经济学家证明，在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劳动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总合生产力高于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坏的市场经济具有除了政治之外所有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不能自由进入，尽管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以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但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政府垄断部门也可以获得大量垄断利润，但其他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降低，因而限制了市场容量的扩展，有害于经济增长。政府垄断不仅造

成了贪污腐化，而且降低了经济的商业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内生比较优势，以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第二，不存在政府机会主义。从西方社会经济变迁的经验看，早期英国的成功源于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英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进行有效地限制，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的。法国在大革命前是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尽管经济有一定自由，但政治上专制。此外，法国官商勾结，而英国的官商关系体现为“建设性的冲突”。有学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了一套宪政游戏规则。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相反，法国当时虽然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但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第三，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机制。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看，18世纪的法国，由于收入分配不公，一般人买不起很多产品，生产仅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效率高。由此可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当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是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一些经济学家也分析了18~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美国的收入分配比英国公平，所以，美国的市场容量大于英国。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要快于英国。其实，由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富悬殊，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群体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能力失衡的结果。追求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是好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因而，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公正利益博弈制定有效的规则，是好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

第四，制度创新。落后国家通常具有“后发优势”，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可以模仿发达国家，包括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历史和现实表明，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尽管技术模仿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快的增长，但会给长期增长埋下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增长失败。日本是制度模仿成功的案例，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则是技术模仿失败的案例。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技术模仿来实现工业化。尽管当时的效果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当然，这并不排除可以有很好的国有企业。不过，对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研究表明，没有经验证据支持在可比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更高。相反却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前者的效率更低。

第五，法制健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制健全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法制健全并不等于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健全，关键在于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是否得到有效界定。不解决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条文无论